

“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

杨 菁

书里书外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根据前不久公布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体安排，此次将邀请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出席纪念活动。

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这样的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

撰写《无间西东：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让我走近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还有被俘受教后投身反战事业的日本战俘。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

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报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

我在乡村教书，给孩子们讲诗，许多同行都好奇：为什么要讲诗呢？既耽误教学进度，又不能让学生获得高分，连高考作文都标明“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可我依然在读诗、讲诗，带更多的孩子认识诗、理解诗。

最初，我是在学校的文学社给孩子们讲，从徐志摩讲到舒婷、海子，在他们似懂非懂的时候，又折回了戴望舒、闻一多。适应诗的变化、理解诗的内涵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何况诗还有着不同的样态，而这又总让学生们对写诗充满焦虑。我跟他们说，我手写我心即可，从眼睛看到的、心里感受到的开始就行，不妨就从教室里飞不出去的麻雀写起，从冬天窗外风吹树林的声音写起。

我第一次对诗有了清晰认知，源于阅读江弱水先生的《诗的八堂课》。这本书让我理解了诗的形成机制以及诗的内部逻辑，这些知识如百川汇聚大海一般，形成了我脑海中关于诗的整体面貌。

从古典诗走向现代诗，这一发展历程中有很多突破和创新。某些诗歌阶段，譬如《诗经》《古诗十九首》出现的时代，人们会囿于音韵，但并不会“以文害意”；而到了李白、杜甫的时代，诗人们大胆突破形制，一样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般人以仄韵形成沉郁顿挫的情绪，李清照却用密集的仄韵表达激昂的情感，随即又用清新的意象和语词对其消解，形成情感的迂回，这也是她诗歌的专属风格。

类似这样的突破和创新，不正是青年人应该呈现的精神状态吗？逐渐从稳定的节奏，走向不确定的表达，仿佛也是一场人生的隐喻。学生接受知识，是稳定态的知识，而面临人生的种种问题，则满是变数；在诗里体验这种变化，更易于学生理解和把握自己的人生。

诗没有框架，没有绝对的一致，变化就是心绪的节奏，就是时代的呼吸。到了近现代，语言现代化暗合精神的现代化。现代诗可以成为影像，也可以是瞬间的感觉，还可以是对未知世界的捕捉……它的样子，是多样而反复的。时代变迁中，人的精神需求不再单一，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接受的知识与信息使得他们往往个性突出，喜欢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不断延展，而诗的丰富性正可以与之呼应。

我曾经读过一首写风景的诗，反复查找其中提到的地名，未果而终。后来忽然意识到，这也许并非确有所指，不过是诗人将内心的世界具体化罢了。直至读到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等，渐渐就理解了自己的贫乏，知道诗意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诗从大地而来，浮在空中，但不可否认的是，诗的根扎在心灵深处。后来再读沈从文、汪曾祺、余华和莫言，就觉得诗的样子更为繁复了，分行确实是诗的外貌，而不分行也是一种可能。分行是节奏的强化，不分行则是精神的连贯。诗的外延，使得它自身愈发自在与强大。

我喜欢和学生一起读诗，我读出的也许是一，他们可能读出了二或者三，还有可能读出无穷。我和学生们说，不要用所学框住你的所思，用心去理解不确定的部分，也许就是走向云端的感觉。根据学生的性格，我喜欢给他们分配不同的写作任务，有时候我的理解也有偏差，就由他们自己重新选择写作的内容，写出心底的声音。

“如果你有足够的继续听/感受神秘流淌过双耳/听见长夜的寂暗/听见寂暗中包裹的嘹亮和喑哑”。一个学生写下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们已经将诗投射到生活里，内化到心里。诗的样子注定无法固定，那么就让它以飞翔之姿，继续去往远方吧。



佚名《马球图》（唐代）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供图

《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

古人真会玩

有何文化意蕴

蔡丰明

游戏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几乎所有人都接触过游戏。襁褓之中，拍起手掌，蹬动双腿，做出天真动作；走进学校，课余时间玩老鹰抓小鸡、躲猫猫；到了老年时代，闲暇之余，许多人也会玩棋牌类游戏。

过去，较少有人来专门探讨游戏。游戏很难在学术研究的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当前，“文化热”不断高涨，特别是通俗文化、娱乐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对游戏也有了新的认识。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游戏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文化心理学家认为，动物运动系统的新陈代谢和生长发育，内在要求动物不断运动，使其产生一种运动欲，这种欲望一般在物质追求的实际活动中得到满足。当功利性的活动不能满足运动欲时，动物就会自发地“无目的”地运动。功利活动过量时，机体又需要紧张后的放松，这时动物会表现出消闲式的“无目的”运动。这两种“无目的”的运动，便是游戏产生的生理机制。

娱乐性、规则性和文化性是游戏的基本特点。游戏活动后，人们会产生愉悦、舒适、兴奋的感觉，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而所有游戏都必须在一件事先规定的、为大家所遵守的规则中进行。古代节日习俗中有诸多娱乐活动——蹴鞠、击球、射箭、斗草、登高、走月，其中蹴鞠、击球、射箭、斗草都有一整套固定的活动规则，因此是游戏活动。登高、走月虽然也有娱乐性，但因随意性较强，不能称之为游戏。

人们常常按照自己的要求、目的来设计和进行游戏活动，在从事游戏活动时，把自己的主观精神和价值取向融入其中。因此，游戏活动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这是其文化性所在。据文化人类学家考察，一些高等动物也有与人相似的“游戏”活动。区别在于，动物游戏不能体现自我价值，所以不具有文化性，只有人类游戏才是具有文化学意义的娱乐活动。

中国游戏史源远流长。如果从史料记载的先秦时代斗鸡、走狗、六博、赌骰等古老游戏形式算起，中国游戏已有三四千年的历史。如果从发掘的考古材料来看，中国游戏史一直可以推演到遥远的原始时代。《玩物采真：中国古代游戏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记录的就是中国古代纷繁多样的游戏形式，多姿多彩的游戏场景以及形形色色的游戏轶事，它们组成了一幅长长的、色彩绚丽的中国游戏史画卷，反映了中国古代人民在人类文化史上的独特创造。

游戏史与社会史、生活史、民俗史关系密切。社会条件、社会背景和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游戏活动的存在方式和基本特点；各种独特的游戏活动，又会在各个层面上影响和作用於社会。而今，虽然许多古代游戏的的身影已经湮灭了，深藏于这些游戏中的文化意蕴却是持久的。

格物致知 得宜有度

——《天下文明：紫禁城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编辑手记

刘蓉林

《天下文明：紫禁城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以下简称《天下文明》)的作者是20余年前写作《城记》的王军，那时候他还是记者，在为老北京城的保护奔走、调研、书写。自《城记》出版，王军就经常出入三联的编辑部，和大家喝咖啡聊天。他曾说在旧城保护和未来城市发展规划的工作中，自己反复思考的问题就是：北京城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我们的认知是否远远不够？凭借难以遏制的求知欲，他研究梁思成，研究中国古建筑，研究城市规划。他遵循梁先生提出的对中国建筑的环境思想进行研究的要求，开始在文化根源和思想制度上做深入的探索。

中国古建筑主要为木制，很难跨越历史的长时段保存下来，当年梁思成带领营造学社的同仁发现唐代建筑佛光寺东大殿时的激动心情，简直可用直击灵魂来形容。而在北京城的中心，保留了一个完整的明清紫禁城。虽然紫禁城创建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晚期，但其建筑制度源出上古，其中承载的人文信息，反映了数千年一脉相传的知识与思想体系，呈现出中国古代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惊人的稳定性、持续性与适应性，值得深入研究。

紫禁城的平面规划在建筑布局、模数体系、构图比例等方面，皆以《周易》经传

为根本遵循，所以作者说：“紫禁城如同一部平铺在京华大地上的《周易》注疏。”观象授时是《周易》的思想底蕴，中国古人以地平方位为坐标测定时间，衍生出时间与空间合一的观念。这一观念深刻定义了营造制度。紫禁城不同的空间对应着不同的时间，后者赋予前者不同的人文意义，这成为规划布局的依据，也成为认识紫禁城的重要线索。

《天下文明》这部著作并不那么容易“啃”下来，但通过阅读，当你了解到紫禁城的平面规划以及明清北京城的整体设计，和我们印象中抽象、玄妙的《周易》以及遥远、高深的古代天文学有着如此直观的联系，当你理解紫禁城宫殿的斗拱攒当数、御道石板数、平面比例具有如此朴实的文化意义，当你理解琉璃的色彩和阴阳五行承载着农业文化最具基础性的时空体系，你会对紫禁城和中国文化史产生更加真切的认识。

2016年，王军调入故宫博物院从事学术研究。开始写作《天下文明》是在2020年，其中的第一章是为紫禁城建成600年而作；而这本书的出版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这期间，王军身患重病，但笔耕不辍，只要有需要，他都乐于作为“导游”带人们参观故宫。他会讲殿堂的方位及其所对应的时间意义，讲金水河的

新书上架

《欧洲予倩文献图传》：高音主编，杨乐、林金姬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书是关于欧洲予倩的第一部文献图传，展现这位中国戏剧开路先锋、中国戏剧教育先行者的人生经历、艺术之路和思想脉络。

《我们的国家公园》(全5册)：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省管理局等主编；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这套书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大熊猫、三江源、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5处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和珍稀动植物。

捕捉城市的心跳声

——我写长篇小说《平衡》

滕肖澜

小说《平衡》所指的“平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主人公葛向阳的职业，他是航空公司的平衡员，负责不同航班旅客、货物、行李的配载，使飞机保持平衡；另一层，是指人生无时无刻不在寻求一种平衡的状态。工作中，葛向阳是平衡高手，飞机重心把控得精准无比；但生活中却是左右支绌，爱情、亲情、友情，一再失衡失重。

我以往的写作，虽然题材各有不同，比如《城中之城》是金融题材，故事架构和人物设定比较职场，《心居》则是从一个上海大同堂的大家庭出发，写不同境遇下的普通百姓生活——但在写法上变化并不大，都是起承转合的传统风格，故事徐徐展开，从容写人物写细节。但这次《平衡》完全不同，采取了梦里梦外跳进跳出的方式。梦里情形与现实呼应，梦是现实的延展、纠错、补偿，又反过来对现实生活推波助澜，类似于心理暗示，激发出人性某种幽深而未必自知的部分。

从某种程度上说，梦里的人像是真人的替身，把真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想做又不敢做的事，统统说个遍做个遍。但微妙的是，最终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爽”，并没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恣意。小说里葛向阳在梦中回到过去，就像提前拿到试卷一样，“会做的、不会做的，统统填上标准答案。掐着之前的缺点，一一改正”，最终还是落空了。只因生活恰恰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10多年前，我也曾是一名机场的平衡员。小说里写葛向阳搭乘波音747大型货机的平衡表——“货舱九十块板，A加B有限制，A加B加C有限制……配置第一块板的时候，就要想到第二块、第三块乃至最后一块。板与板之间都有联系，彼此牵制互为因果”，这其实是我的切身感受。那种对重心一步步的摸索，像是自己跟自己较劲，为繁冗的过程带来解谜般的乐趣，很奇妙。尤其货机多半在深夜配载，周围一片寂静，几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

一直写上海，这座我无比珍视的城市。喜欢她那种宽和亲切又恪守分寸的层次感，为写作带来源源不断的灵感。但也必须承认，写了20年上海，在尝试过不同角度、不同题材之后，也会觉得越来越难写了。身在其中，时间空间上零距离，一会儿感叹她的纷繁多变，令人眼花缭乱，一会儿又觉得似乎还是老样子，找不到突破口。

《平衡》动笔前，我下定了这篇小说的风格，“用天马行空的叙述方式，写一个日常的故事”。坦白说，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次，

读书有味

诗的样子

王彦明

我在乡村教书，给孩子们讲诗，许多同行都好奇：为什么要讲诗呢？既耽误教学进度，又不能让学生获得高分，连高考作文都标明“文体不限，诗歌除外”。可我依然在读诗、讲诗，带更多的孩子认识诗、理解诗。

最初，我是在学校的文学社给孩子们讲，从徐志摩讲到舒婷、海子，在他们似懂非懂的时候，又折回了戴望舒、闻一多。适应诗的变化、理解诗的内涵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何况诗还有着不同的样态，而这又总让学生们对写诗充满焦虑。我跟他们说，我手写我心即可，从眼睛看到的、心里感受到的开始就行，不妨就从教室里飞不出去的麻雀写起，从冬天窗外风吹树林的声音写起。

我第一次对诗有了清晰认知，源于阅读江弱水先生的《诗的八堂课》。这本书让我理解了诗的形成机制以及诗的内部逻辑，这些知识如百川汇聚大海一般，形成了我脑海中关于诗的整体面貌。

从古典诗走向现代诗，这一发展历程中有很多突破和创新。某些诗歌阶段，譬如《诗经》《古诗十九首》出现的时代，人们会囿于音韵，但并不会“以文害意”；而到了李白、杜甫的时代，诗人们大胆突破形制，一样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一般人以仄韵形成沉郁顿挫的情绪，李清照却用密集的仄韵表达激昂的情感，随即又用清新的意象和语词对其消解，形成情感的迂回，这也是她诗歌的专属风格。

类似这样的突破和创新，不正是青年人应该呈现的精神状态吗？逐渐从稳定的节奏，走向不确定的表达，仿佛也是一场人生的隐喻。学生接受知识，是稳定态的知识，而面临人生的种种问题，则满是变数；在诗里体验这种变化，更易于学生理解和把握自己的人生。

诗没有框架，没有绝对的一致，变化就是心绪的节奏，就是时代的呼吸。到了近现代，语言现代化暗合精神的现代化。现代诗可以成为影像，也可以是瞬间的感觉，还可以是对未知世界的捕捉……它的样子，是多样而反复的。时代变迁中，人的精神需求不再单一，尤其是年轻的学生们，接受的知识与信息使得他们往往个性突出，喜欢在自我的精神世界不断延展，而诗的丰富性正可以与之呼应。

我曾经读过一首写风景的诗，反复查找其中提到的地名，未果而终。后来忽然意识到，这也许并非确有所指，不过是诗人将内心的世界具体化罢了。直至读到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等，渐渐就理解了自己的贫乏，知道诗意有各种各样的存在方式。诗从大地而来，浮在空中，但不可否认的是，诗的根扎在心灵深处。后来再读沈从文、汪曾祺、余华和莫言，就觉得诗的样子更为繁复了，分行确实是诗的外貌，而不分行也是一种可能。分行是节奏的强化，不分行则是精神的连贯。诗的外延，使得它自身愈发自在与强大。

我喜欢和学生一起读诗，我读出的也许是一，他们可能读出了二或者三，还有可能读出无穷。我和学生们说，不要用所学框住你的所思，用心去理解不确定的部分，也许就是走向云端的感觉。根据学生的性格，我喜欢给他们分配不同的写作任务，有时候我的理解也有偏差，就由他们自己重新选择写作的内容，写出心底的声音。

“如果你有足够的继续听/感受神秘流淌过双耳/听见长夜的寂暗/听见寂暗中包裹的嘹亮和喑哑”。一个学生写下这样的诗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他们已经将诗投射到生活里，内化到心里。诗的样子注定无法固定，那么就让它以飞翔之姿，继续去往远方吧。

《平衡》：滕肖澜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因为脱离了我的舒适区，有太多不确定性。现在想来，这次大胆的挑战，或许是平衡工作带给我的启发。每一份平衡表的诞生，看似是近乎流水线的刻板操作，但借由不同的人来做，从第一个集装箱位写下第一个数字起，重心就像排列组合，有无穷个可能性。写作亦是如此。当我从以往的惯性经验中跳脱出来，换一种从未试过的写法，重新描摹我所熟知的生活，就像有什么东西修地地打开，一下子开阔了。都说都市是水泥森林，那么，这次我想捕捉水泥森林的心跳声。咚，咚，咚。

读书

本版邮箱：dushu@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胡妍妍 版式设计：赵德汝